



中国伊斯兰教文化
——以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为例

作者

Dr. Ahmed Gamal Aly Mohamed Khalifa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صين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في الصين نموذجًا)

أحمد جمال علي محمد خليفة

قسم الدرا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لغات والترجمة، جامعة الأزهر، القاهرة، مصر

البريد الإلكتروني: 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الملخص:

مما لا شك فيه أن التعليم هو حجر الأساس في نهضة الأمم وتميبتها، ويرفع مهارة القوى العاملة في أي دولة، وقدراتها التنافسية فيما بينها، كما يعد التعليم عنصرًا أساسيًا لتقوية الهوية الوطنية ورفع المستوى الثقافي، ووسيلة لا غنى عنها في عملية التنمية الثقافية. و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تعليم الديني لمسلمي "قومية هوي" في الصين، فقد سجل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دورًا كبيرًا في تطوير ثقافتهم الوطن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كما يمتاز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في الصين بالعناية بتدريس العلوم الدينية، وتعليم المهارات التي تساعد في بناء الإنسان وتهذيب سلوكه. وفي ظل عقيدة إسلامية راسخة ومعايير أخلاقية، فقد حافظ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في الصين على بناء مواطن مسلم صيني يتحلّى بأخلاق فاضلة وسلوك قويم، كما كان له الفضل في تدريب وتأهيل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معلمين والأئمة، كل هذا في سبيل الحفاظ على استمرارية وازدهار الحياة الدين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لمسلمي الصين. ولم يتوقف دور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على تأهيل المعلمين والأئمة، بل إن بعض المسلمين في الصين يقومون بإكمال دراستهم العلمية بعد تخرجهم من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ثم يلتحقون بالجامع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تخصصات مختلفة، ليصبحوا أكثر إبداعًا داخل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في مجالات كثيرة. ولا يزال الكثير من مسلمي الصين

ينهلون العلوم الشرعية و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داخل المساجد ليكون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أحد المصادر الرئيسية التي تقوم بدورٍ مهمٍّ في نشر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حتى يومنا هذا.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عليم المسجدي في الصين، معايير أخلاقية، الثقافة الوطنية،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Chinese Islamic Culture

Mosque Education in China as a Case Study

Ahmed Gamal Aly Mohamed Khalifa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E-mail: 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Abstract:

Educ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as it determines the caliber and competitiveness of a nation's labor force. Furthermore, Education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means for the perpetuation and renewal of social culture, because it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the Hui people in China,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is primarily achieved through mosque education. Mosque education not only provides religious knowledge based on the tenets of faith itself, but also promotes moral and behavioral education based on religious beliefs and ethical values. Thus, such education has produced virtuous Muslims and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educators and Imams for Chinese Muslims. Some people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after acquiring the knowledge presented at mosques, and become useful professionals in various fields. Mosque education continue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 to this day.

Keywords:

Islamic Culture, Mosque Education in China, Moral Standards, National Culture, Chinese Society.

中国伊斯兰教文化 ——以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为例

Ahmed Gamal Aly Mohamed Khalifa（艾哈迈德·杰马勒·哈利法）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邮箱: 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摘要:

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决定着一个民族劳动力素质和竞争力。教育也是社会文化延续和更新不可或缺的手段, 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回族而言, 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经堂教育来实现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既重视宗教本身的内容, 又教导人们如何做人, 即进行道德教育, 它在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 造就了有德性的穆斯林, 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大批的经师、阿訇。有些人在经堂教育中学到一定知识后继续深造, 成为其他方面有用的人才。时至今天, 经堂教育在中国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伊斯兰文化, 中国经堂教育, 道德规范, 民族文化, 中国社会

论文的目的

很多非华裔穆斯林、阿拉伯人或者学习汉语的研究者都知道，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穆斯林人口众多，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院也很多。但他们很少了解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如何在那里传播、穆斯林的状况以及谁在传播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实现以下目标：1、介绍中国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2、介绍清真寺教育在中国各个时代所发挥的作用，揭示其在中国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的课程和体系；3、增加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以及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生活影响的了解；4、介绍一些中国的穆斯林学者和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为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所做的努力。

前言

“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教育制度，以它进行的场所而命名。所谓“经堂”是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的布局中的一个场所，一般多在主体建筑大殿的前边建有南北厢房，北面的就是经堂，也被称为“北讲堂”。20世纪以来，中国穆斯林一般将这种在经堂之内进行的宗教教育称为“经堂教育”。¹经堂教育兴起于明朝末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场宗

1 冯增烈：《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219页。

教改革运动，在经堂教育兴起以前，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教育制度。明中叶以后，随着回族共同体的形成，回族的民族意识开始日益增强，文化上的认同成为迫切的需要，因为这对于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自我确认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回族来说，文化认同最现实的道路就是宗教文化的建设，因此，与此同时，在中国西北地区产生了经堂教育。¹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主要是外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通婚为纽带传播伊斯兰教，他们通过家传口授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经典和教义。后来随着这些外国侨民由客居转变为定居成为中国公民，他们的后裔逐渐地融入在中国社会之中。他们的后裔在语言文字上开始学习汉文的过程，入儒学，学儒典，对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反倒生疏了。当时有两件事可以维持他们的宗教信仰：第一，伊斯兰教礼拜寺的存在；第二，阿拉伯、波斯以及后来的中亚传教士不断来中国传教。到明朝后期，由于明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很难进入中国传教，从而造成中国伊斯兰教职人员的危机，培养宗教人才就成了当务之急。经堂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²经堂教育的实施为中国穆斯林群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丰富宗教学识的阿訇和能够满

1 李晓英：《从经堂教育看回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28 卷，第 3 期，第 88-90 页。

2 李晓英：《从经堂教育看回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28 卷，第 3 期，第 88-90 页。

是中国穆斯林社区宗教生活需求的宗教教职人员，从而保证了散居中国各地的回族群众几百年来对伊斯兰教的坚定信仰。

一、学问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

伊斯兰教崇尚知识，鼓励求知，奖励有学问的人。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只有真主和学问文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仪姆兰的家属章：7}¹又说：“你们应当请教深明教诲者，如果你们不知道。”{蜜蜂章：43}²又说：“这些譬喻，是我为众人而设的，只有学者能了解它。”{蜘蛛章：43}³又说：“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创造者章：28}⁴又说：“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队伍章：9}⁵又说：“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辩诉者章：11}⁶类似的经文有几十处，这里不一一例举了。这些经文中的知识和教诲不仅是宗教的科学，而且是每一种有用的知识，都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赠金他的思想，使他对生活更有经验，对生活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

“逊奈”⁷中也有很多圣训强调学问的重要性，由穆阿维

1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2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3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

4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页。

5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

6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7 逊奈：阿拉伯语 Sunnah 的音译，意为“行为”、“道路”等。与“圣训”同义。

耶·本·阿比苏富扬¹（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真主意欲给谁福利，便会使其精通教门。”²由阿布·达尔达伊³（愿主喜悦之）传述自先知（愿主福安之）说：“谁踏上了求知之路，真主为其开辟一条通往天堂的坦途。天使们为寻求知识的人放下了翅膀，以表达对其所做所为的喜悦。天地的居民，甚至水中的鱼，都向真主为求知者请求宽恕。学者的优越胜过虔诚的崇拜者，就像月亮胜过其他的星星一样。学者们是先知们的继承人，他们既没有留下迪纳尔，也没有留下迪拉赫姆‘财物’，只遗传了知识。因此，无论谁获得了知识，他就获得了丰富的遗产。”⁴由艾奈斯·本·马利克⁵（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一项主命。知识传授给不适宜的人，犹如珠宝金银戴在猪身上。”⁶类似的圣训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

众所周知，“圣训”是对《古兰经》的解释和补充。通过上面《古兰经》的经文和“圣训”中能知道学问和求知对穆斯林

1 穆阿维耶·本·阿比苏富扬：他是伊斯兰教圣门弟子之一，属麦加古来什部落倭马亚家族，曾任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的书记。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三册，第 120 页。

2 《布哈里圣训集》：第 7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37 段。

3 阿布·达尔达伊：名字叫阿米尔·本·马利克，伊斯兰教圣门弟子之一，辅士。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二册，第 336 页。

4 《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2682 段。

5 艾奈斯·本·马利克：他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弟子，辅士。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随穆罕默德历经大小战役 8 次，故对他的思想主张和道德风貌都有很深的了解。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归真后，他在麦地那致力于圣训的传述和研究，为早期圣训教法提供了不少经典性资料。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二册，第 396 页。

6 《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224 段。

男女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主命。因此，父母必须为孩子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二、中国回族先民的伊斯兰教育

伊斯兰教与伊斯兰的传播是齐头并进的。《古兰经》包罗了各种科学知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又是国家的元首，又是最高法官，又是穆斯林知识和道德的最高导师，又是日常生活、卫生、健康等方面的指导者。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培养了许多宣教人员，并派往各地宣教、教育新穆斯林，培养了一批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派往各省的总督、行政长官，也培养了许多学者、圣训学家、教法学家。

伊斯兰教通过阿拉伯穆斯林传到世界各地，然后通过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传播。但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第一批阿拉伯穆斯林是谁？他们是圣门弟子还是再传弟子？如果他们是圣门弟子，他们是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时代还是在他逝世之后到达中国？如果他们在先知时代到达，那么是在先知迁徙到麦地那之前还是之后？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历史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来说明伊斯兰教在先知时代曾传播和进入东亚各国。而事实是，我们无法足够准确地知道伊斯兰教何时以及如何进入这些地区。然而，我们发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伊斯兰教自先知时代以来就进入了这些地区。这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

历史证明，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以贸易闻名于世，阿拉伯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一种古老的关系，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也一直延续着。贸易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他们在东方、西方和北方进行贸易，特别是在印度洋，甚至成为欧洲、印度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中介，这是在欧洲人发现从大西洋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之前。阿拉伯商人过去运送印度和中国的货物经过沙姆地区和埃及，即从红海到达欧洲地区，然后从那里把货物运到印度、中国和日本。¹

如果我们回顾伊斯兰教在伊历元年的传播方式，就会发现早期的穆斯林热衷于将这一伟大的宗教传播到全世界。中国商人到阿拉伯国家的商业旅行，以及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沿海的旅行，是阿拉伯和中国文化交往的基础。这使得伊斯兰教迅速进入中国边境，直到它带着最初一批穆斯林心中的宽容、和平和爱渗透到中国境内，这些穆斯林常常用伊斯兰道德来吸引那些与他们打交道的人。²

阿拉伯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早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关系为先知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所熟知，甚至阿拉伯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知识，虽远在

1 赛义德·苏莱曼·纳达维：《阿拉伯-印度关系》，译者：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出版社：埃及国家翻译中心，第一版，2008年，第29页。

2 艾哈迈德·哈密德：《伊斯兰教就是这样进入三十六个国家的》，新月图书馆（贝鲁特-黎巴嫩），第一版，1981年，第41-42页。

中国，亦当求之”一则被误传为圣训的阿拉伯民谚¹。一千多年来，这种民间谚语在阿拉伯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中口耳相传，这句话一直被用来激励人们求知，并耐心地对待求知过程中所面临的艰辛和困难。“求知并努力获得知识的现象”是人们在文化和道德上想要相互传播的真实现象，他们互相鼓励要坚持不懈，以良好的心态和耐心对待求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不断求知。托马斯·阿诺德爵士²在他所著《伊斯兰的传播》中说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名字并非不可能，因为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得到加强，是因为到达黎凡特和地中海港口的东方贸易主要经过阿拉伯国家。公元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通过锡兰进行了重要的贸易。七世纪初，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仍然广泛。”³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这一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向有争议，其说法甚多。可是，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朝永徽二年，即公元 651 年。据中国史籍《旧唐书》与《册府元龟》记载，这一年伊斯兰教第三任哈里

1 阿拉丁·阿里·本·胡萨姆·阿尔丁：《力行者的言行圣行中的宝藏》，出版商：（贝鲁特：信息基金会），1981年，第5卷，第202页。

2 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1795-1842）是19世纪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古典教育的价值，是英国古典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参见易红郡：《英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

3 托马斯·阿诺德爵士：《伊斯兰教的传播》，译者：易卜拉欣·哈桑、阿卜杜勒·马吉德·阿布丁博士和伊斯梅尔·布哈里，出版社：（开罗：埃及兴起图书馆），1970年，第331页。

发奥斯曼（644～656 在位）派使节到唐朝首都长安，晋见了唐高宗并介绍了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经过。这是阿拉伯帝国第一次正式派使节来华，对后来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以及穆斯林商人的东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历史学家一般将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¹

随着伊斯兰文化在全球各地的传播，进入异国他乡的穆斯林们，首要的是通过伊斯兰教育来保持自己的信仰，并教育和培养后代延续坚持这种信仰。中国伊斯兰教育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回族著名学者冯增烈认为：“历史上的回族教育，基本上是以三种形式在进行：第一，是阿拉伯模式的教育；第二，是汉化教育；第三，是这两种教育的交叉。”²尽管划分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肯定了回族教育始于回族形成为民族之前，即回族先民时期就有了最初的伊斯兰教育。这与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的伊斯兰教育的历史是相吻合的，与伊斯兰教崇尚知识、鼓励求知、奖励有学问的人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是伴随伊斯兰教的传入而开始了。早在回族形成之前的唐宋时期，中国穆斯林的祖先从阿拉伯、波斯等地来华的穆斯林蕃客，就在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2 山东省民委编：《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页。

他们留居中国组成的家庭中进行一种原始的穆斯林家庭宗教教育。这个时期的中国穆斯林要举行五时拜功的宗教仪式，想要学会诵读《古兰经》，也要学习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教法，所以必须接受伊斯兰教育。这段历史时期的这种教育方式是适应当时中国穆斯林和来中国穆斯林们侨民生活的需要的。根据资料归纳为以下几种¹：（1）中国穆斯林在自己的家中向他们自己的子女和信仰真主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口头教授阿拉伯语，教会他们诵读《古兰经》，过宗教生活，口头教授基本教义和教法。（2）来华传教的阿訇和宗教学者向穆斯林群众口头传授伊斯兰文化，传诵《古兰经》，教授他们生活中的语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3）阿訇和宗教学者在各地设“回子房”，作为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中心。

以上形式可以说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先民们早期的伊斯兰教育形式，后来成为大师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的基础。

三、经堂教育形成前的中国穆斯林教育

中国穆斯林一开始了解伊斯兰教就重视伊斯兰教文化，就是说“中国自有回教‘伊斯兰教’，即有回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因回教自有使以来，即与其文化相表里，回教一离其自来之文化，定必失其本真。而文化一离回教，亦必非回教文化。所以，回教在中国一千多年，终未脱离旧有的文化。时至

1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8页。

今日，回教文化在中国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¹但从七世纪到十五世纪，伊斯兰教在中国基本上还“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²。在此期间，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等地穆斯林沿着海陆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者日益增多，由于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有不少人自愿留居中国，其中有的人还在当地联姻通婚而定居下来。他们定居中国后，不仅领导着广大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而且传授伊斯兰教文化，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巩固的重要条件。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伊斯兰教育主要以家庭教育为主，一般采取口头传授的方式。当时，穆斯林来自不同的民族，讲不同的语言，分布在全国各地。由于共同信仰，宗教生活中都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就使穆斯林间有某些共同的语言，也使他们在一起感到亲切。尽管他们没有自己的学校，但是他们在所受的家庭教育方面是共同的。无论何时，家庭教育都是各种教育形式中的第一位，它对每个人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经师³、阿訇坚持让其子弟念经，深入学习宗教知识。也有一些经师、阿訇，除培养其子弟

1 王静斋：《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1939年），原载《会教论坛半月刊》第二卷，1939年，第2、3、4、5期。参见丁士仁主编：《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2 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3 经师：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大师的称谓，他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通晓《古兰经》、“圣训”和其他经籍。该称谓于明末至清代，随着内地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兴起而普遍使用。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外，还以师徒的形式培养少数有志于圣学的人，如胡登洲就是“幼肄儒业，长随同乡高师祖习受本教之学”¹。然而，这种家庭形式的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培养出的人也为数不多。

来华的穆斯林人数增多。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穆斯林教育也有了新的发展。根据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逐步形成了共同居住区域。所以哪里有穆斯林聚居，哪里就会有清真寺。穆斯林参与宗教活动，就必须学念阿拉伯语的经典和伊斯兰文化，所以在清真寺内进行伊斯兰教育是必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汉文化教育深、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回回代表人物也比以往增多。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堂教育形成之前，中国穆斯林除家庭启蒙教育之外，只有经师、阿訇在小范围内的家、本宗族和教坊范围内接受少数人在家施教，尚未形成一种教育制度。

四、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创立与发展

长期以来通过家庭传承、父传子受的伊斯兰教育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穆斯林大众的需求。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大量增加，随着清真寺数量的激增，经堂教育应运而生。经堂教育正式形成于明朝末年，由陕西伊斯兰学者胡登洲创办。

胡登洲（1522- 1597），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易勒雅

1 冯增烈：《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中国穆斯林》1981年，第2期，第24-27页。

斯，回族，被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巴巴”¹。他本人家境富裕，早年学习汉语和儒学，后随经师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教义和哈乃斐派教法。后前往麦加朝觐，回国途中游历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伊斯兰国家的教育状况。他感到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迫切需求，意识到伊斯兰教育的重要性。他首先招收数名学生于其家中，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后移至清真寺办学。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部分学生靠捐助。由于这种办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较为简单，易于推行，所以清真寺内设学之风迅速传开，逐渐普及到回族居住的各个地方，成为一种延续数百年而不衰的教育制度。胡登洲之举适应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需要，他不愧为回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其功绩不可磨灭。正因为如此，胡登洲被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被誉为胡太师；中国著名穆斯林学者庞士谦²则誉称“陕西为中国回教文化发源地，亦中国回教最高学府所在地”³。由

1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2 庞士谦（1902-1958），他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阿訇。经名穆罕默德·特瓦杜尔，回族。1922年，20岁时任郑州清平里清真寺阿訇，讲授伊斯兰教经典。后来返回原籍创办经文（阿拉伯文与汉文）小学，他在郑州参与创建“伊斯兰文化研究社”。1930-1937年间任北平成达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授阿拉伯语课程。1938年率《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就读于教法学院，专攻教法与圣训等学科。1942年起，任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且荣膺埃及国王法鲁克东方事务顾问，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1947年回国后，在北平参与创建回教经学院并任教。1952年曾参与建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该会成立后任常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病逝。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440页。

3 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载《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4期。白寿彝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此可见，“经堂教育”这一名称的出现和应用并不是在胡登洲前，而是后期的事。

当时，由于西北地区从陕西到甘肃、青海，回族分布较为集中，回族村庄几乎连为一片。回族人口增加，清真寺增多，需要大批宗教人士。此外，回族使用汉语汉字，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越来越少，不能诵读《古兰经》。所以，胡登洲顺应穆斯林社会发展的潮流，率先创办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后来，胡登洲的亲传弟子加以改革，把经堂学校设在清真寺，由清真寺周围的回族群众共同负担，这一方法很快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回族地区。到明朝末年，经堂教育已广泛流传于陕西、山东、北京、云南、甘肃等地。很多本地和外地男青年到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育，如教义、教法、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修辞等伊斯兰教知识。后来逐渐在全国穆斯林聚居区得到普遍实行，并且不断得到完善。由于学风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经学风格的学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以下五个：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金陵学派、云南学派和河州学派。¹还有一些学者将其分为陕西学派、山东学派；还有的学者将其分为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金陵学派和云南学派。我将在下面提到这些经堂教育中最重要的：

（1）陕西学派

1 马忠、张广麟：《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概述》，朱崇礼主编：《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转引自：丁士仁主编：《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24页。

陕西学派是中国回族经堂教育的源头，由胡登洲所创，并由其弟子冯养吾和张少山等经师的经营，形成了其独特的教学和思想特点。该学派非常重视研究认主学，这很可能与胡登洲想要确认逊尼派的正统地位、消除什叶派影响的立场有关。为了同样的目的，该学派也很重视研究哈乃斐教法，因为哈乃斐学派是逊尼派的正统教法学派之一。在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一百五十年后，陕西经堂教育的发展陷入低潮¹。西安小皮院²周良隽³阿訇开始重振经堂教育的发展，培养很多弟子，他们学成后分别在西北地区、河南、云南等地开学，讲经授徒，影响范围之广可想而知。陕西学派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它注重“精而专”，（1）研究认主学，经注学和教法学；（2）注重宗教知识的精而专，一般专攻阿拉伯文经典，甚至仅专攻教义学；（3）重视逻辑推理和辩证分析，其好处在于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和对整体意思的全面把握，它非常适合讲解哲学和教义学的学科，因此陕西学派在教义学方面有独特的专长⁴。陕西学派的这一学风，在陕西和其他一些地方一直得到遵循和发扬。

1 哈吉·黄登武：《中国经堂教育与陕学阿訇》（内部资料）第五版，第26页。

2 据传，小皮院清真寺兴建于唐末，宋徽宗（大观）丁亥年（1107年），真教寺为长安京兆四坊旧有“清真寺”，是西安伊斯兰教最早建筑之一。

3 周良隽：清代伊斯兰教经师。字默斋，陕西泾阳人。回族。被经堂教育尊为“周老爷”。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称，由胡登洲倡兴的经堂教育传授至他时，学问更为渊博，讲解更为严密，追求更为细致，而经文大学之林立，人才之辈出，亦皆在于此时。参考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488页。

4 丁士仁：《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回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51-55页。

(2) 山东学派

山东学派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教学派别之一。以胡登洲第五代弟子常志美（1610- 1670）为代表，他是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师之一。该学派由陕西学派分化而出，属于胡登洲传授体系。¹被尊称为“常巴巴”。他是回族人，他知识渊博，精通波斯文，潜心研究宗教哲学。最大的贡献在于，除了阿拉伯文经籍的著述外，还非常重视讲授波斯文经典教义。常志美原籍中亚地区撒马尔罕，九岁随叔父奉使入贡北京，遂留居陕西，后至山东济宁，与当地常姓联宗而姓常²。其学说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经堂教育中的山东学派。华北地区穆斯林多尊之为“常巴巴”（“巴巴”，波斯语义同爸爸）。山东学派的学风重“博而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掌握伊斯兰教博大精深的学问，在讲授《古兰经》时兼授教法和教学法，同时继承陕西学派的传统，对认主学也颇为重视。山东学派盛行于山东、河北及东北地区，同时在其它地方也有一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常志美不仅传承了胡登洲开创的经堂教育，还继承了胡登洲捍卫逊尼派的立场，剔除什叶派影响，最终在中原确立了以马图里迪派³为教义学派和哈乃斐派为教学法的逊尼派信仰体系。正是这次革新运动奠定了之后回族穆斯林的基本面⁴。

1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页。

2 李兴华：《济宁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129—141页。

3 马图里迪派：自称“伊斯兰教正统派”。因其信徒追随马图里迪而得名。10世纪兴起于撒马尔罕，以反穆尔太齐赖派为己任，其学术观点与艾什尔里派“伊斯兰教正统派”大同小异。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第508页。

4 周传斌：《经学大师常志美与回族伊斯兰教的第一次革新运动浅识》，《伊斯兰文化》，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3) 金陵学派（汉学派）

所谓“中国伊斯兰教金陵¹学派”是指明末至清代。该学派的代表人物用汉文翻译、撰写、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他们在坚持伊斯兰教根本信仰和主要功课的基础上，力图从深层思想上将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是南京籍或是曾经在南京游学、讲学的学者，例如王岱舆²、伍遵契³、马君实⁴、刘智⁵等都是南

1 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

2 王岱舆（约 1570- 1660），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和经师，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人，回族。别号“真回老人”。幼承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及儒、佛、道典籍，从事译著。以儒家学说诠释《古兰经》，为中国伊斯兰教两大学派之一的汉学派创始人。他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先驱者。他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阐明了伊斯兰教，为建立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与教义学的框架，并奠定了理论基础，表现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互补，开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之先河。北上京师于正阳门外讲经论道。译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参见杨杯中：《回族史散论》（中册），宁夏人民出版社版，第 674 页；又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85 页。

3 伍遵契（约 1598- 1698），中国明清之际伊斯兰教经师，回族，江苏南京人。出身于经学世家。幼年学习儒书曾中秀才。但他抛弃功名，潜心研习伊斯兰经典。曾在胡登洲四传弟子山东学派的常志美门下学习，后再南京、江苏等地清真寺讲学、培养经师。他在译著过程中，首先摘引《古兰经》与“圣训”的有关论述，然后阐述自己的理解，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早期从事译著的主要人物之一。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602 页。

4 马君实：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明经），汉文译著家，至今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他是王岱舆的老师。清代初年，提及马君实与王岱舆的资料主要有：1658 年，马君实给王岱舆的《希真正答》写过弁言。王岱舆：《希真正答》，北京清真书报社，1925 年版，马君实弁言。

5 刘智（1655- 1745），清代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回族，江苏南京人。出身经学世家，深受学习伊斯兰教经籍。以他为代表的“汉学派”，为中国伊斯兰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以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为本，他把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思想相结合，以及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的中国人解释伊斯兰教，让他们迅速接受伊斯兰教。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18 页。

京人，张中¹（江苏吴县人）、马注²（云南保山人）虽然不是出生在南京，但却分别是在南京游学、讲学的学者。从学说体系上讲，他们更是一脉相承，不仅理论渊源相同，而且表述形式以及试图达到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由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且主要代表人物都与南京有关，故称“金陵学派”。³金陵学派的特点为“以儒诠经”、“汉语著述”，理论包含深厚的苏非思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仍然受到陕西经堂教育的滋养，例如王岱舆本身就是胡登洲四传弟子马君实的学生，所以金陵学派的代表人物也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以这两种文字的经典为依据来阐释伊斯兰文化和哲学思想。该学派以刘智（1655- 1745）的思想达到了顶峰。他在中国伊斯兰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⁴

实际上，金陵学派所创立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理论体系，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碰撞、对话，进而有机结合的结果。它不

1 张中（约 1584- 1670），中国明清之际伊斯兰教经师、学者。回族，江苏苏州人。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自幼学习经典。曾在扬州、苏州等地讲经授徒。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页。

2 马注（1640- 1711），中国清初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用汉文译著经典的开创者之一。回族，今云南省保山市人。他是中国伊斯兰教义思想体系创立者之一。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3 米寿江：《金陵学派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及其当代意义》，中国江苏伊斯兰教协会官方网站，2014年12月24日，<http://www.jsysl.com/show.asp?id=75>

4 转引自杨杯中：《对王岱舆、刘智学术地位的再认识——致杜维明先生的信》，《回族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4-108页。

仅从深层次上完成了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进程，而且从哲学、伦理学等诸方面丰富了伊斯兰思想理论的宝库，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理论体系。由于金陵学派学者们的著述几乎全部用汉文和儒家语汇表述，所以也便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士阅读，它不仅为不同群体提供了一个了解伊斯兰教的渠道，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民族误解，而且也由于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含有对中国传统哲学观点的不同诠释和解析，因此它对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4）云南学派

明清时期，云南出现一批学通伊儒释道的穆斯林学者，他们主动改革“经堂教育”，开展“以儒诠经”和“以回补儒”的活动，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学术传统、相对自成体系、思想特点鲜明的学术派别，被称为“云南学派”。不只包括在经堂教育上有自己的特点，更在学术传承、学术体系、学术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代表人物从明清时期的马注、马德新¹、

1 马德新（1794—1874）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经师。字复初。经名优素福，号鲁哈·丁（意为“宗教魂”）。回族，云南太和人。幼年随父学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长大后，来到陕西长安，从胡登洲四传弟子、著名经师周良骏学习伊斯兰经学，成为经师。1841年，他前往麦加朝觐，后游学开罗、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等地，与各地伊斯兰学者广泛接触，并搜集伊斯兰教伊斯兰经籍。马德新毕生致力于阐扬伊斯兰教义和文化。马德新与王岱舆、马注、刘智被并称为“中国四大经学家及译著家”。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331页。

马安礼¹、马联元²，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甚至诞生了绵延数百年的经学世家。他们在思想来源上有共同性、理论主张上有继承性、表达形式上有相似性、活动目的上有一致性，对中国伊斯兰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云南学派以马德新（1794- 1874）和马联元（1841- 1895）为代表，他们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学派。以阿拉伯语教学、亦兼授一些波斯语典籍为特色，同时也注重汉语的翻译和著述。另外，云南学派的一大特点是，提倡用阿拉伯语著述，并自编阿拉伯语教材。马德新编写的简明阿拉伯语词法和语法教材为中国阿拉伯语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云南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两重点，即：第一，该学派既重视理论构建，又重视功修实践。如果说金陵学派对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伊斯兰教哲学体系，那么云南学派在重视理论构建的同时，更加重视宗教功修和宗教实践。例如马注不仅是宗教职业者，他还十分重视穆斯林对宗教伦理道德思想的运用，在他所著《清真指南》说：“上穷

1 马安礼：中国清代后期伊斯兰教学者。生卒年代不详。字敬斋。回族，云南人。系著名回族穆斯林学者马复初（1794- 1874）的弟子和得力助手。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具有较扎实的古汉语基础，经常协助乃师完成汉文伊斯兰经籍译著。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2 马联元（1841- 1895）清末云南新兴人，回族，字致本。出身于经学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22岁任经师。约于清同治三年（1864）第一次去麦加朝觐，遍游叙利亚、埃及、印度各国。首创汉文阿拉伯文并授的教育制度。曾印刻《古兰经》。参见白寿彝：《马联元- 王宽- 马万福》，《中国穆斯林》，1984年第二期，第2-6页。

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¹被称为中国穆斯林在宗教实践上的“完美向导”²。马德新、马联元不仅是穆斯林知识分子，更是虔诚的宗教职业者，他们十分重视内在的信念和道德教化，提倡大众化的信仰实践路线。马德新说道：“无路而可游，无门而可入者，拜之功也”“朝拜者，是为克己复礼之功，尽人合天之道”“礼拜乃近主之阶梯，归原之途径，渡患海之舟艇”³等，他的著述更多指出了宗教信仰实践、宗教功修的道路和途径。

第二，该学派主张“中阿并授”⁴。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惟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⁵的尴尬局面。因此，马德新提倡学习汉文，首倡《古兰经》的汉文通译⁶，他主张阿拉伯文和汉文经书并授，从而奠定了云南经堂教育的基础和特色。马德新和马联元在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同时，能运用汉语顺畅地

1 (清)马注：《清真指南》[M]。余振贵，标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 王建平：《论十八世纪初的云南格兰岱教案》[J]。耘世界宗教研究粹，1998年(3)，第10页。

3 马继祖：《马复初遗著选》[M]。香港：国际(香港)华人出版社，2003年，第23-29页。礼拜并不是单纯的仪式那么简单，他是真主安拉要信徒对自己言行举止的总结与忏悔，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行为中都会有不当的地方，举手投足有时不能以教规来约束自己，所以需要做礼拜来总结自己并忏悔。

4 所谓“中阿并授”，是中国回族阿文学校要求教育者对汉文和阿文都要讲授。所谓“经书两通”，是要求学习者学成后达到既通阿文，又通汉文；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又通晓儒家经典。

5 (明)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余振贵，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6 最早致力于《古兰经》汉文通译工作的，是清代回族学者马德新。参考马涛：《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与现实》，阿拉伯研究论丛，2021年，总第11期，第124页。

解释教典，这是不同于陕西、山东学派的一大特点，亦是欠缺经堂教育实践的金陵学派所没有的。马联元在具体的教育措施上，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学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首倡“中阿并授”，实现了经堂教育的新突破。

由此可知，云南是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思想传播、交流、发展的中心之一，云南学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理论主张和学术风格，也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学者。

（5）河州学派

河州学派是清末形成的一个学派。河州今名临夏，是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元、明以来，这里形成为回族聚居区之一，有“中国小麦加”之称。该学派以马万福为代表，注重教法教律的研究。它是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的主要形成和传播地。17世纪下半叶以后，由境外和新疆来的苏菲派教士在这里传播苏菲主义，使苏菲派教理在中国内地得以传播。该学派使经堂教育由深研认主学而变为深研教法学，或者说认主学与教法学并重。¹经堂教育在河州兴起以后虽培养了一批大阿訇，但他们绝大多数不识汉字，只能用经堂口译来讲解经典。因此，河州学派在20世纪对内地经堂教育的发展做过两大贡献，即在教材和教学语言方面进行过有效的改革，有力的推动了阿拉伯语的教学，确立了河州学派在20世纪中国伊斯兰教

1 参考冯今源、铁国玺：《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经堂教育中的中心地位。¹

总之，尽管以上所述的中国经堂的几个学派风格各异，各有所长，但都为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活动的需求培养了数不胜数的人才，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穆斯林的传播积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五、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宗旨和特点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不仅是中国穆斯林民族历史上的主要教育形式，而且对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有着很大影响。因此，中国经堂教育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回族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中国穆斯林学者王静斋²大阿訇所说：“中国回教经堂教育，偏重于奉行天道服从人道。天道之荦荦大的有五功：念、礼、斋、课、朝。人事方面，注重正心、修身、爱众、卫国、救世。”³事实上，这也是对一个合格的穆斯林的基本要求。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小学、中学和大学，各阶段的要求自然不同。小学是对儿童的启蒙教

1 丁士仁：《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回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51-55页。

2 王静斋（1879-1949）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家、翻译家。与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名阿訇”。经名叶尔孤白。回族，天津人。出身于经师世家。8岁时随其父王兰庭阿訇读阿拉伯文，后进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学习经训和教义。26岁时毕业了。他学识渊博，通晓《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和伊斯兰教历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也会古汉语和英语。他毕生潜心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翻译伊斯兰经典，译著很多，被誉为“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页。

3 王静斋：《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9页。

育，目的是使他们获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的基本知识，满足其以后宗教生活的需要。中学只为成年的穆斯林传习宗教知识而举办的一种业余性的宗教常识教育，只有少数清真寺举办，目的是传授必要的宗教知识，满足日常和宗教生活的需要。大学属伊斯兰的高等教育，目的是培养清真寺的阿訇和具有更高水平的经师和学者。¹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特点在于以下几种：

（1）经堂教育宣扬了伊斯兰文化。经堂教育通过对教义学、教学法、认主学、经注学、圣训学和有关的语言学、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天文地理学的系统讲授，使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重新确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在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经久不衰。与此同时，包含着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经济文化制度的伊斯兰文化。

（2）经堂教育巩固中国穆斯林民族共同体。中国穆斯林居住分散，民族不同，语言习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通过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人生观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注重群体价值，反对分裂。这些都使回族等集体意识更为强烈，宗教感情更为深厚，并往往通过坚定信仰、恪守教规、维护伊斯兰文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来实现其民族内部的

1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8页

团结和统一，从而形成了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和主导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国穆斯林居住分散，民族不同，语言、习俗各异，而经堂教育通过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把各穆斯林民族熔铸于一个文化之中，从事经堂教育的德高望重的阿訇，由于聘任制的作用，冲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不断地游学于各穆斯林地区，用同样的教义、教规，同样的语言向穆斯林群众宣教游说，从而加强了各地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团结。”¹

（3）经堂教育推动了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学术活动，特别是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明末清初，经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张中、伍遵契等，都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者。他们还以“以儒诠经”的独特尝试，翻译了很多阿拉伯——伊斯兰文献，为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为比较宗教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维护伊斯兰文化和民族团结起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4）经堂教育注重提高回族等穆斯林大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无论经师还是学生，都要择品德端正者。对教师而言，既重视教师的能力与功绩，又重视其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对学生而言，既培养学生的才能，又注重品德教育。阿訇

1 马明亮：《西北伊斯兰教育文化》，载《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二期；又参见马明良：《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前瞻》，穆斯林在线，2022年12月29日；又参见马明亮：《回族经堂教育之得失及其出路》1998年第4期，第71页。

不仅带领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还要向穆斯林讲经，宣扬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引导穆斯林遵从伊斯兰教倡导的生活方式，弘扬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

但是，这种传统的教育体系还很不完善，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在：第一，宗教信仰主导教育，重视教义研究，忽视其他方面，特别是科学文化知识的综合教育；第二，没有严格科学的教育体系，教学质量缺乏检验。学生是否能够毕业全靠阿訇个人决定，而没有科学的考核方式，因此无法保证高质量；第三，教学方法的形式主义，使学生只注重死记硬背，忽视对宗教经典和宗教精神的理解，缺乏创造力；第四，这种教学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距甚远，经师和学生都不认识汉字，也不读中文书籍。经堂教育只传授宗教知识，而宗教知识仅限于经典和语言知识不变的层面，数百年来一成不变，束缚了青少年的心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穆斯林纷纷要求革新经堂教育，发展新式宗教教育。20世纪初，中国伊斯兰教出现了新式教育即学校式现代教育。创办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回族伊斯兰教育，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由“念经”向“念书”过度的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形式，在回族社会中产生并发展起来。1906年，中国著名阿訇王宽¹先生到麦加朝觐后便游学埃及、土耳其等地进行考

1 王宽（1848- 1919）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经师、宗教教育革新家。字浩然，经名阿卜杜·拉赫曼。回族，北京人。出身于经学世家。他自幼受教于被称为“北方经学泰斗”的叔祖王守谦，学习刻苦，成绩卓著，具有深厚的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基础知识。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页。

察，他在充分考察了埃及、土耳其等国的教育状况后，致力于中国的伊斯兰教教育的改革。为振兴宗教，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他主张改革经堂教育陈旧的内容，倡导举办经学与汉学并举的新式学校。

1907年，他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了新式教育“回文师范学堂”，由他的弟子达浦生¹主持教务，改良教学方法，增订课本，既学习伊斯兰教的经学知识，又学习汉文与科学知识。中国著名的王静斋阿訇写道：“古都名阿訇王浩然²大师游历土耳其等回教国家归来之后，因得到新的知识不少，乃在北平牛街大寺创办改良大学，由达浦生阿訇担任教授，阿文的一切课程照旧，另添读法、作文、会话等课，更增加国文一课。自是

1 达浦生（1874-1965）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教育家。与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并称为“中国现代四大名阿訇”，经名努尔·穆罕默德。回族，江苏人。出身伊斯兰经学世家，7岁时开始学习汉文，10岁时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攻读伊斯兰经籍，他爱国爱教，毕生致力于穆斯林事业，为发展中国伊斯兰教育和宗教领域的对外友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2 王浩然（1848-1919）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经师、宗教教育革新家。字浩然，经名阿卜杜·拉赫曼，回族。北京丰台人。出身于经学世家，他自幼学习刻苦，成绩卓著，具有深厚的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基础知识。青年时代，他开始出任各地清真寺教长，从事讲学活动。1906年，到麦加朝觐后便游学埃及、土耳其等地进行考察。为振兴宗教，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他主张改革经堂教育陈旧的内容和方法，倡导举办经学与汉学，并举的新式学校。1907年，他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新型的回文师范学堂，由其弟子达浦生主持教务，改良教学方法，修订课程内容，在经堂教学中兼授汉文及其他文化知识，以培养新式师资。1908年，他为改变经堂教育的方法陈旧，就主要以新的宗教文化教育，提高经、汉知识水平为宗旨。他继续发展宗教教育事业，从而培养了诸如达浦生、马松亭等一批伊斯兰教经师和学者。王浩然一生从事宗教教育，改革旧式学堂，关心穆斯林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支持社会进步，在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19年，于北京病逝。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页。

以后，中国回教教育，另开一新纪元”¹。又在1908年办起“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此后在上海、南京等地任教长时，仍继续发展宗教教育事业，从而培养了诸如达浦生、马松亭²、杨明远³等一批伊斯兰教经师和学者。进而于1912年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其宗旨是“兴教育，固国体，回汉亲睦”。

对此各地回民积极响应，相继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分支机构。王宽⁴阿訇的举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开创

1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工作通讯》1997年第8期，转引自海俊亮：《探寻经堂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之路——兼谈全面提高伊斯兰教界的整体素质问题》[J]，《中国穆斯林》2008年第3期，第47-50页。

2 马松亭（1895-1992）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与王静斋、哈德成和达浦生并称为“中国现代四大名阿訇”。经名阿卜杜·拉希姆。回族，北京市人。他出身阿訇世家，青少年时期学习阿拉伯文，研究伊斯兰教教义、教法。他在北京、清水、济南、重庆、台北、香港等地清真寺任职讲学，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30年代，他曾两度出访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经商谈选送了很多穆斯林学生在该学校留学深造，其中不少人后来在中国的教育、科研、翻译和宗教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1934年，访问埃及、巴勒斯坦等国，携回了有各种书体的成套阿拉伯文铅字，对在中国铅印伊斯兰经籍和教材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他用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赠送中国穆斯林的大批经书在北平（北京的旧称之一）创建了颇具规模的“福德图书馆”。1945年后，历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等职。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页。

3 杨明远（1895-1965）中国当代伊斯兰教著名经师。经名努尔·穆罕默德。回族，祖籍江苏南通，生于河北省通县（今为北京市通州区）。随其父杨耀宾阿訇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当他长大后，入王宽创办的回文师范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从师在该学堂任教的两位土耳其伊斯兰教学者哈夫斯·哈桑和阿里·里达学习《古兰经》诵读法和现代阿拉伯语，并兼学汉文及其他文化知识。后投名师达浦生、等阿訇门下继续深造。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奋，在教学中注重因材施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并聘请穆斯林教师给学员讲授汉语，以培养经、汉文皆通人才。他经常同伊斯兰学者王静斋、马坚、杨仲明等互通阿拉伯文书信，探讨伊斯兰教学术问题。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

4 王宽：他就是王浩然。

了中国经堂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先河。与此同时，经堂教育的改革也深入到各族穆斯林、各地穆斯林中。如 1925 年，马松亭阿訇等人在济南创立“成达师范学校”（后来迁到北京）。哈德成¹、达浦生等人于 1927 年在上海创立“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28 年成立的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1930 年成立的昆明明德中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在穆斯林较多的地方，开识字班，聘请回民为教员，教授文化知识，以提高穆斯林的文化素质，还聘请阿訇教念《古兰经》。²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学院于 1955 年在北京成立，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爱国爱教和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宗教人才”³，聘请曾就读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著名学者、对伊斯兰教做出贡献的著名阿訇以及掌握文化知识的优秀教师任教，还聘请了来自埃及和其他国家的专家来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文化。在全国各地招收具有一定经文知识和汉语水平的男性青年，开设认主学、《古兰经》诵

1 哈德成（1888- 1943）中国现代伊斯兰教学者、教育家。与王静斋、达浦生、马松亭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名阿訇。经名希拉勒丁（Hilal al Din，即宗教的新月）。幼年曾读儒书，并由其父学阿拉伯语。16 岁时，到江苏镇江和河南投伊斯兰教经师深造。后担任上海浙江路清真寺（俗称“外国寺”）教长，认真研究经义，自修阿拉伯语、英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1928 年与达浦生等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并选派优秀生前往埃及留学。他爱国爱教，毕生献身于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对教义研究较深，对《古兰经》的微信大义，理解尤精。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89 页。

2 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948-1023 页。

3 杨宗山：《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四十年工作回顾》，《中国穆斯林》，1995 年第 12 期，第 25-27 页。

读及注释、圣训学、教学法、阿拉伯文学等，此外还开设文学、汉语等课程。1978年后北京、宁夏、陕西、云南、新疆、河南、等地相继建立了伊斯兰教经学院，招收穆斯林学习伊斯兰教的有关课程和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宗教知识扎实、素质较高的宗教人才。目前，中国回族穆斯林主要通过经堂教育和经学院两种方式培养宗教人才。并且随着社会的需求，相应开设外贸、现代阿拉伯语、法律、经济等专业，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经学院毕业的学生不再单一从事教职工作，而是综合性的专业人才。研究生的培养宗旨则是“以培养高层次伊斯兰教经学院教育人才、伊斯兰教学术人才和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为目标”¹。阿訇班招生简章中明确“根据当前中国中青年阿訇缺少学历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今后做阿訇须获得学历的发展趋势，为了对有一定水平的在职阿訇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除进一步提高专业领域的知识外，更需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完善阿訇的知识结构”²。阿訇本科学历班旨在提高在职阿訇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这是对经堂教育出身的阿訇进行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再教育。

六、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影响

1 参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门户网站：《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2020年硕士研究生班招生简章》，2020.2.5，转引自：穆卫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穆斯林》，2023年第3期，第27-32页。

2 参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门户网站：《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2020年阿訇本科学历班招生简章》，2020.2.5，转引自：穆卫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穆斯林》，2023年第3期，第27-32页。

经堂教育改变了中国穆斯林社会以往父传子受以家庭为传承方式培养阿訇和经师的作法。使狭小的家庭教育扩大为社会化的教育方式，使宗教教育由独立的个人行为转变为社会化的行为。经堂教育的普及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堂教育的影响体现在于以下几点：

(1) 经堂教育传承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与价值。经堂教育通过师生之间情感交往和系统讲授有关伊斯兰教义、教法、阿拉伯语、哲学等方面的核心课程，形成一条蔓延不绝的伊斯兰知识传播链条，为穆斯林男女讲授伊斯兰文化知识。其教育注重培养学员的信仰并把普通教育作为宗教知识的补充。¹因此，为发挥其文化传播的功能，经堂教育应提高师资队伍及教学质量，课程设置应既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避免学员单方面宗教知识的学习，加强对学员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训练及其对基本文化素质的训练，以使其适应社会发展并为社会服务。此外，培养起一支相对稳定的伊斯兰知识人才队伍，这支队伍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和与穆斯林群众的日常交往，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群众讲授伊斯兰知识和价值观，扩大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影响范围，努力使穆斯林的信仰与生活现实相适应，从而在中国社会塑造出一个独特的伊斯兰文明群体，延续和发展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1 张立敏：《回族经堂教育在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及挑战——以云南巍山县永建镇为例》，《学园》2010年第2期，第44-48页。

(2) 经堂教育协调稳定社会。伊斯兰教非常重视倡导道德观，伊斯兰教的传统道德伦理是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所倡导道德，既包含人对真主的信仰、顺从、敬畏、虔诚几对主命的遵守；也包含调整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有利于穆斯林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培养高尚的社会道德。通过中国经堂教育，中国穆斯林能够传播伊斯兰文化教育，无论是对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家庭与婚姻、促进小区经济发展、稳定当地的社会治安都带来很大的作用。¹此外，经堂教育所宣传的教义和教法能够使中国穆斯林群众形成稳定而紧密的共同体。如中国深通教义和教法的阿訇在当地具有较大的权威，这种宗教权威具有法律所没有的调解民事纠纷和教派纷争的功能，通过引导经堂教育来协调、稳定社会，成为国家民族治理的一部分²。所以，中国经堂教育及其成员在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经堂教育因为弘扬伊斯兰的信仰与各种道德，赢得了穆斯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很多穆斯林调解家庭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求助对象，对维护穆斯林社会和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3) 经堂教育提高了中国穆斯林大众的爱国主义情感。经堂教育，根据伊斯兰教经典的精神，贯穿一种感恩思想和爱国思想，阿訇们经常讲的是那一句名言：“你们要爱你们的家

1 马和斌：《清真寺文化与穆斯林核心价值观之形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5期，第74-80页。

2 李小卫：《浅析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6年第6期，第61-65页。

园，犹如鸟儿爱其巢窝一样”。中国穆斯林深深地眷恋着他们世代生息的中华热土，他们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守望相助、休戚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偶有纷争，不久也能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他们把对祖国的感情深埋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几乎不用直白的语言歌唱祖国、赞美祖国，更不习惯于空喊口号，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但关键时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祖国献出一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中国穆斯林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新冠肺炎疫情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为国捐躯的精神和果敢行动是热爱祖国的最好证明。经堂教育已经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并正在发挥重要现实作用，人们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那些为经堂教育辛勤付出心血和智慧的人们。中国经学院教育体系始自 1955 年成立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该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造就热爱祖国、有相当宗教学识和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宗教人才”¹，面向全国穆斯林青年招生。

（4）经堂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深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伊斯兰教经学家。经堂教育长期开展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教学活动，为后来进一步开展着两种语言尤其是阿拉伯语的教学积累了历史经验，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外语教学的历史内容。

（5）经堂教育使得中国穆斯林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独

1 杨宗山：《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四十年工作回顾》，《中国穆斯林》杂志，1995 年第 12 期，第 25-27 页。

特的宗教教育体制，这一制度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长期生存和传播，也对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经堂教育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经堂教育的历史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方式，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七、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课程

传统教育以“十三本经”¹为主要教材，包括教义、教法、《古兰经》经注、“圣训”和语法修辞等课程。改革开放后，许多清真寺均开始增设阿拉伯语、英语、汉语等实用性课程，一些清真寺还增加了教法原理学、古兰学、圣训学等国内较新的学科。较之传统经堂教育教材不同的是：（1）设置了汉语文化和英语的教学；（2）设置了传统经堂教育所没有的原理学课程，如教法原理学、教义学原理、圣训学原理、古兰学等；（3）除了传统的《伟戛业》《噶最》外，还设置当代的教法书籍《哈乃斐教法》和《经注精华》；（4）增加了圣训的课程量，以往只作为参考资料的两大部圣训集均作为教材讲习；（5）增设了伊斯兰历史和宗教比较学的课程，如《宗教与派别》；（6）安萨里、塔哈维等的典籍作教材使用；（7）增设了

1 参见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载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广增：《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及其基础课初探》，载《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2期，第4-9页；《经堂教育基础课的沿革》，载《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3期，第15-19页。

现代阿拉伯语和书法教学。

这些教材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教派之间有所不同，不过有十三种主要教材，各地各派基本上都采用。实际上，在经堂教育的教学中，各地根据各自需要，在“十三本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辅助教材，并非整齐划一。但主要经典基本上是一致认可的“十三本经”，即（1、《连五本》；2、《遭五·米斯巴哈》；3、《满俩》；4、《白亚尼》；5、《阿夏伊德·奈赛斐》；6、《伟嘎耶》；7、《虎托布》；8、《艾尔白欧》；9、《米尔萨德》；10、《莱麦阿特》；11、《海瓦依·米诺哈吉》；12、《古洛斯坦》；13、《古兰经》）。因此，根据经堂教育使用的主要教材和辅助教材制作了如下图表：

| | 类别 | 经典名称 | 备注 |
|---|----|-------------|---|
| 1 | 语言 | 《连五本》（字、词法） | 包括《素尔夫》、《穆尔则》、《咱加尼》、《米额台·阿米莱》和《米斯巴哈》等五种统称“连五本”，原名《艾萨苏·欧鲁姆》，意为“基础知识”，都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和句法的语法教材。以上五本由杨仲明阿訇之混合简单的中文译本，名为《中阿初婚》。 |

| | | |
|--|-------------------|---|
| | <p>《遭五·米斯巴哈》</p> | <p>是对语法教材《米斯巴哈》的详细诠释本。</p> |
| | <p>《满俩》(语法)</p> | <p>又名《舍拉合·卡菲耶》，作者：波斯人阿卜杜拉赫曼·加米。此书是阿拉伯语法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有一定深度。</p> |
| | <p>《白亚尼》(修辞学)</p> | <p>又名《台落黑素·米夫特哈》，是阿拉伯文修辞学名著，作者是呼罗珊地区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塔夫塔扎尼(1321-1389)。</p> |
| | <p>《海瓦依·米诺哈吉》</p> | <p>即《波斯文法》，书名系阿拉伯文音译，意为“道路的方向”。是中国清真寺及经堂教育中使用最早的一部基础波斯语语法教科书，由山东济宁回族穆斯林学者、著名经师常志美(1610—1670)用波斯文著成。</p> |

| | | | |
|---|---------------|---------------|---|
| | | <p>《古洛斯坦》</p> | <p>即《真境花园》伊斯兰哲理诗著作，经堂教育中波斯文学读本，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古洛斯坦》乃波斯文音译，意为“花园”、“园圃”。此书传入中国已有 600 年历史，流传广、影响大，作为中国经堂教学中学生必修的波斯文课本，深受穆斯林大众的推崇和喜爱。</p> |
| 2 | <p>《古兰经》注</p> | <p>《哲俩莱尼》</p> | <p>是对《古兰经》的简要解释，由贾拉勒丁·阿尔穆哈拉（卒年：1459）撰写，并由贾拉勒丁·阿尔苏尤提（卒年：1505）完成。在中国经堂教育中使用历史最长，使用率最高，传播最广，影响最大。</p> |
| | | <p>《噶最》</p> | <p>《拜达维古兰经注》，亦有《嘎最经注》之称，为波斯著名学者纳绥尔丁·拜达维所著，是逊尼派重要的《古兰经》注解之一，在伊斯兰教经学文本中享有盛誉，是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主要教材之一。</p> |

| | | | |
|---|------|--------------|--|
| | | 《伊本·凯西尔》 | 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宗教文献，在伊斯兰世界、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都具有重大影响。 |
| 3 | “圣训” | 《米什卡提》 | 主要择录了《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部分圣训，为逊尼派圣训集。本书是为居住在中国清真寺的学习者开设的课程。 |
| | | 《塔志》（《圣训之冠》） | 《使者圣训中的综合原则之冠》，作者：谢赫·曼苏尔·阿里·纳赛尔，译者：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翻译家、伟大的思想家优素福·陈克礼先生（1923-1970）。 |
| | | 《布哈里圣训实录》 | |
| | | 《穆斯林圣训实录》 | |
| | | 《利雅德圣训集》 | |
| | | 《虎托布》 | 是对四十段圣训的注解本。有李虞宸阿訇的中文译本，名为《圣谕详解》。 |
| | | 《艾尔白欧》 | 是对四十段圣训的注解，但《虎托布》偏重于道学，本书偏重于理学。 |

| | | | |
|---|----|------------|--|
| 4 | 教法 | 《伟嘎耶》 | 是伊斯兰教法名著，也是逊尼学派常用的课本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必备教材，被列为“十三本经”之一。此书为哈乃斐学派，盛行于中国、印度、及中亚一带，有王静斋阿訇中文译本，名为《伟戛业》。 |
| | | 《费格亥·逊奈》 | |
| | | 《费格亥·尔巴代提》 | |
| | | 《教法学原理》 | |
| 5 | 教义 | 《凯俩目》 | 又名《阿戛伊德·奈赛斐》，作者是《白亚尼》的作者赛尔德丁·塔夫塔扎尼。此书为认主学中的杰作，陕西学派者多务此学，中国学者译为《教典诠释》。有杨仲明阿訇之中文译本，名为《教心经注》。 |
| | | 《费格亥·艾克白尔》 | 有人译为《大学》。 |
| | | 《尔盖德·塔哈维》 | |
| 6 | | 《米尔萨德》 | 波斯文哲学著作。此书共分五门四十篇，都是讲修道、养性、近主之道。有吴子先生中文译本，名为《归真要道》。 |

| | | |
|------|---------|--|
| 苏菲主义 | 《莱麦阿特》 | 又名《艾什阿图·莱麦阿特》，波斯文认主学著作，著者也是《满俩》的作者。意译为《昭元秘诀》，系哲学中杰作，为回教认主的最高理论。 |
| | 《耶海亚依》 | 这本书又被译为《宗教学科的复兴》，即《圣学复苏》，大约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不久即被作为一般清真寺“大学”的教材，至今不衰。 |
| | 《麦克图巴提》 | 又名《书信集》，作者：伊玛目·然巴尼·艾哈默德·希尔信迪，原文为波斯文。公元1886年5月至1887年7月间，哈萨克斯坦著名伊斯兰学者谢赫·穆·穆拉德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于公元1901年在麦加出版。不久《书信集》的阿拉伯文本——《麦克图巴提》被中国朝觐者带回，在上海影印出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两个版本的《书信集》作为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读本倍受青睐，一直延续至今。 ¹ |

1 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麦克图巴提》，译者：马生智，出版社：香港天马2010年9月。

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以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为例

| | | | |
|---|------|----------|---|
| 7 | 汉文经典 | 《天方性理》 | 是清代思想家刘智所著的，是中国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古籍文献之一，是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伊儒会通的重要著作。 |
| | | 《伊斯兰教常识》 | |

中国经学院课程设置上既保持对传统经堂教育的继承，又吸收了当代的新教材和文化课程，如下图所示：

| 类别 | 传统经堂教育 | 当代新式经堂教育 |
|---------|----------------------------|------------------------------------|
| 教义 | 《教典诠释》 | 《教典诠释》、《信仰》、《大学》、《塔哈维教义学》 |
| 教法 | 《伟嘎耶》 | 《伟嘎耶》、《哈乃斐教法学》、《教法通论》 |
| 《古兰经》经注 | 《噶最》、《哲俩莱尼》 | 《噶最》、《哲俩莱尼》、《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学》、《古兰学》 |
| 圣训 | 《虎托布》、《艾尔白欧》 | 《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塔志圣训集》、《利雅德圣训集》 |
| 苏菲主义 | 《古洛斯坦》 | 《莱麦阿特》、《耶海亚依》、《麦克图巴提》 |
| 语言 | 《连五本》、《满俩》、《遭五·米斯巴哈》、《白亚尼》 | 现代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法、英语、《连五本》、《满俩》 |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伊斯兰教育的课程设置发生重要变化，具体如下特点：

(1) 注重文化与政治思想教育。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从开始之初就开设了政治、汉语、历史等课程。在文化课和政治课方面不断调整，历年来所设该类课程有现代汉语、阅读与写

作、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纲要、古代汉语、中国伊斯兰教史、世界伊斯兰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概论等；政治思想方面设有爱国主义教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¹

(2) 专业学科与课程设置更加丰富。经过几十年的办学历程，目前中国经学院设置学科更加丰富，课程也更加细化，比如教法课细化为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一年级）、伊斯兰教法课（三四年级）、教法原理学（四年级）、阿訇实践课（四年级）；《古兰经》类教学细化为《古兰经》选讲、《古兰经》原文翻译、《古兰经》注释、古兰学、《古兰经》注释学、《古兰经》诵读学；阿拉伯语学科则细化为阿语精读、阿语泛读、阿语语法、阿文书法、报刊选读、阿语口语、高级阿拉伯语、阿拉伯语言文化；汉语学科细化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与写作。专业课除了教法、教义、《古兰经》、圣训四大原理学外，还开设有宗教比教学、伊斯兰教思想史概论、宗教学概论、民族学、回族历史文化、文献研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经学思想史、阿拉伯语言文化概论、波斯语等课程。²

总之，经堂教育的课本，文字上主要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两种，有的阿訇专攻阿拉伯文，有的专攻波斯文，也有少数阿訇二者兼通。课本的内容主要是《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

1 穆卫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穆斯林》，2023年第3期，第27-32页。

2 穆卫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穆斯林》，2023年第3期，第27-32页。

兰教各种教义教法等功课。由于受世界伊斯兰教学术思潮的影响，“认主学”曾经是经堂教育的主要课程。

八、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的汉文译著

17世纪开始兴起的汉文译著活动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国化民族化的继续深入和发展。明末清初，中国东部地区的穆斯林大部分散居，且与汉族杂居，一些穆斯林宗教信仰趋于淡薄；同时伊斯兰教也受到统治者和汉族上层的歧视，又不为广大非穆斯林群众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当时的发展环境，中国伊斯兰教中不少经汉兼通的宗教学者开始用汉文译著一批有关伊斯兰教的宗教读物，这些汉文译著作在明代晚期陆续在江南等地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著名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以及后来马复初的一批译著，等等。这些宗教著作的重要特点就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内容上采取了以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义相结合的方式，用这些宗教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来阐明伊斯兰教的教理，借用儒家来解释自己（伊斯兰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采用儒家学说去阐明伊斯兰教，借用儒学权威来维护伊斯兰教。与经堂教育相一致，汉文译著的出现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这些汉文译著也大多成了经堂教育的重要读物。

我们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过程中深切感到，汉文译著活

动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译著活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都使经堂教育培养出的杰出人才，是胡太师的数传弟子¹。同时，他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宗教教育的需要。例如《归真要道》是经堂教育课本的汉译，《四篇要道》是用汉文编写的经堂教育的通俗教材，《希真正答》是学生汇集老师对日常所提问题的解答。马德新和马联元的著述有不少也是当时的教材。这些“汉克塔布”²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大多数人的宗教知识不是借助阿拉伯语而是通过它们获得的。

九、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使用的语言文字——经堂语

“经堂语”是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是运用汉语语法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三种不同词汇或词组交互组合成句的独特的汉语表达形式。即，主要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音译词，意译词，赋予宗教含义的汉语词，自创词等几类。

回族先民是唐宋元时期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其构成成分很复杂，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地区的人，他们最

1 杨为仁：《（经学系传谱）对江苏伊斯兰教史的重大贡献》，《中国穆斯林》1991年第4期。李兴华：《略论明清之际回族等民族伊斯兰教新特点的形成》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29页。

2 汉克塔布：“汉”即汉文之简称；“克塔布”，乃阿拉伯语“经典”、“典籍”之意。为用汉文书写的经典，即伊斯兰教汉文经典著作之总称。因明清之际，回族人大部分已不能阅读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一些伊斯兰学者遂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典籍，产生了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马注的《清真指南》等一批名著。

初来到中国大陆主要是为了发展贸易，与汉人做生意。其组成部分的复杂性决定了其语言的多样化属性。同时，作为外来族群，来到中国大陆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沟通障碍。为了融入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们必须在语言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即放弃母语，转而学习汉语。最终回族先民放弃了自己的母语，选择了汉语作为交流工具。但是，他们的一些宗教术语无法用中文准确翻译和替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用汉字创造自己的词语，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来表达宗教内涵。这些新创造的词语在书面记录和日常交流中经常使用，但在普通汉语中却很少见到。¹

中国阿訇在演讲时也广泛使用和传播经堂语，经堂语也完成了从专门语言到日常生活语言的转变和转变，更加贴近中国穆斯林的生活，成为穆斯林人民世代相传的日常用语。经堂语词汇主要由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谐音意译语四种成份构成。第一、大部分都是中文的。除了常见的基本词汇外，在翻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时，一般会采用适当的词法来构成具体的词汇。如“天命”、“圣行”、“定然”、“归真”、“慈悯”、“天方”、“感赞”、“教门”、“干功”等。第二、阿拉伯语音译。如“伊玛尼”（信仰）、“安拉乎”（真主）、“穆民”（信士）、“色俩目”（祝你们平安）、“泰斯米”（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塞白卜”（原因、缘由）、“顿亚”（今世）等。第三、

1 马辉芬：《回族经堂语造词法浅探》，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34页。

波斯语音译。如“胡达”（真主）、“乃玛孜”（拜功）、“朵斯提”（朋友、教友）等。第四、将阿、波词汇与汉语词汇谐音译意。如“瘰麻尔”（波斯语，原意为“有病”，有时指生理缺陷或毛病）、“多罪海”（波斯语，译作“火狱”）等。¹

据研究者考证，中国穆斯林在诸如见面、宰牲之前、食饮之前、婚庆、添丁、节日庆典、丧礼等场合会比较集中地使用经堂语。例如，中国穆斯林一见面会互致“色俩目”，互称“朵斯提”，在宰牲、食饮、起床、外出等等前首先念诵“泰斯米”（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可以说，“泰斯米”一词及其所代表的专用语，已成为中国穆斯林宗教和社会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词汇。当中国穆斯林家庭生下孩子时，父母会邀请阿訇到家里做客，或者带孩子去清真寺给孩子取经名。命名后由阿訇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向婴儿耳中念诵“邦克”（宣礼词）。给新生儿取经名的过程，是一个家长和阿訇交流的过程，经堂语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的交流。

中国经堂教育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著作，但前来学习的学生们的母语却是汉语。为了能让学生们尽可能多地理解教材内容，经师不仅要用汉语，口头上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原文直译过来，以达到教学目的，这就需要经师有相当高的汉语修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师多使用汉语的

1 余葶：《经堂语与穆斯林的日常生活》[J]. 中国宗教，2006（08），第29-31页。

语法规则，并将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结合起来，以利于学习和理解。由此，一些“常用汉语词汇”在经堂教育的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这部分词汇原属“经堂教育”中的“教学用语”，后被明代伊斯兰经学家刘智称为“经堂语气”，后人称之为“经堂用语”或“经堂语”。实际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称为“经堂用语”比“经堂语”更为严谨。因为它根本不是一种新语言，它是汉语的一种专门术语。但由于回族人常用“经堂语”这一名称，所以语言学界本着约定俗成的原则也认同了这一概念。¹

总之，经堂语是中国穆斯林学者在经堂翻译经典或演讲时所使用的融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一体的混合语言。它基本从属汉语语法的范畴，多用于口头，而且在翻译上严格遵守直译和逐字逐句翻译的原则。这种语言由于一般在经堂讲经和清真寺的演讲时使用而被称做“经堂语”。经堂语的学习和使用以及经堂翻译技能的培训和应用，是经堂教育的重要内容；驾驭经堂学员的基本功夫。因此，在经堂教育中，经堂语的使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十、阿拉伯伊斯兰教育与中国经堂教育之间的比较

古代阿拉伯伊斯兰教教育与中国经堂教育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马新芳：《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典范——陕西经堂教育简述》，2019年12月8日。http://www.muslimwww.com/html/2019/xueshu_1208/35169.html

1、两者都强调求知的重要性。伊斯兰教十分重视教育，尊重学者，鼓励人们去求知，以便形成了崇尚智学的社会风气。求知使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考，也有助于他做出适当的决定，从而使人能够感知周围的事物。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常常鼓励人们了解真主的宗教“伊斯兰教”、寻求有益的知识、努力学习并教导别人，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从他那里接受知识的人的状况，由阿布·穆萨·艾什尔里¹（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真主赐予我的正道和知识的比喻，就如同降落在大地上的雨水。有些地方土壤肥沃，就吸收了水分，长出了许多植物和草料。有的地方是坚硬的，能留住水，真主以此为人们所用：他们喝水，灌溉，种植。然而，一些雨水落在盆地，盆地既留不住水分，也不能产生草料。这就是比喻，那些了解真主的宗教，并从真主派遣的正道中受益的人，他学习并教导别人。而有的人不抬起头来接受它（即由于傲慢而不学习和受

1 阿布·穆萨·艾什尔里：全名阿卜杜拉·本·盖斯·本·赛利姆·艾什尔里。阿布·穆萨为其尊称。少年时在麦加信奉伊斯兰教，为较早信教者之一。在古莱什贵族多神教势力加剧迫害穆斯林时，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迁徙至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避难，后被派往其家乡扎比德和亚丁任宣教师，曾为伊斯兰教在也门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期（634~644），被任命为巴士拉军政长官，曾率穆斯林军征服波斯伊斯法罕和阿瓦士地区。后任库法军政长官。657年伊斯兰教上层争夺哈里发权位的骆驼战役在巴士拉爆发，因拒绝派兵增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而被免职。后在阿里与穆阿维叶之间的政治斗争中，曾应库法穆斯林请求，作为阿里一方的代表，出席隋芬战役之后的裁决会议。擅长《古兰经》读法，是圣门弟子中杰出的诵经家之一。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1990年，第二册，第381页。

益)也不接受真主派遣的正道的人。”¹由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²(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除了两件事之外,不应该有嫉妒:一个是真主赐予财富,他以正确的方式消费的人;一个是真主赐予智慧的人,他根据智慧进行判断,并教导他人。”³

关于伊斯兰教对教育问题的巨大兴趣,由阿布·胡莱勒⁴(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凡是聚集在真主的房子(清真寺),诵读真主的《古兰经》,互相学习《古兰经》,宁静就会降临于他们,仁慈就会覆盖他们,天使成群地在他们周围盘旋,真主给在他附近的天仙们提到他们。”⁵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在麦加停留期间,向穆斯林传授伊斯兰教的基础原则和礼仪,写下向他启示的《古兰经》的所有的经文,并背诵《古兰经》。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迁徙到麦地那后,常常坐在穆斯林中间,向他们传授宗教知

1 《布哈里圣训集》:第7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282段。参见穆罕默德·塔希尔·本·阿舒尔:《阿拉伯伊斯兰教育——历史研究和改良主义观点》,出版社:达累斯萨拉姆,第一版2006年,第39页。

2 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他是伊斯兰教圣门弟子,圣训传述家,生于麦加,曾迁徙埃塞俄比亚,后迁徙麦地那,精通《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1990年,第一册,第462页。

3 《布哈里圣训集》:第7141段。

4 阿布·胡莱勒:他的名字叫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萨赫尔,著名的圣门弟子,圣训背诵家和传述家。因其喜爱小猫,故以阿布·胡莱勒(小猫之父)的绰号著称。也门道斯部落人,跟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宣教多年。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1990年,第二册,第578页。

5 《穆斯林圣训集》:第2699段。

识，因此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在向穆斯林们传授知识所存在的座位上穆斯林争夺他出席的地方。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啊！有人在会场中对你们说：‘请你们退让一点吧！’你们就应当退让些，真主将使你们宽裕。有人对你们说：‘你们起来吧！’你们就应当起来，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辩诉者章：11}¹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以两种方式教导人们：（1）向在场的人口授《古兰经》、道德教育、布道和先前先知的报告。（2）他对那些寻求指导的人的问题的回答。²

伊斯兰教的这种重视知识、提倡求知、崇尚智慧的思想在阿拉伯伊斯兰教育和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中国建有大量清真寺，尤其是西北回族聚居地区，经堂教育主要以清真寺为基础。经堂教育遍布全国各地，以西北、山东和云南等地为中心，不仅使回族儿童接受了初步的伊斯兰教教育，也培养了大批著名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经堂教育对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两者都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如果我们回顾伊斯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是他的同伴的第一位老师，敦促他们寻求知识，向他们诵读《古兰经》，并鼓励他们每个人都要学习阅读和写作。事实上，他（愿主福安

1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2 参见穆罕默德·塔希尔·本·阿舒尔：《阿拉伯伊斯兰教育——历史研究和改良主义观点》，出版社：达累斯萨拉姆，第一版2006年，第40-41页。

之)使教育等同于自由的重要性,因为他为巴德尔的一些囚犯提供了赎金,这些囚犯没有钱,让其中一个人教十个男孩如何写作,他们的释放将被清除。当时接受知识的人中有扎伊德·本·萨比特(愿真主喜悦之)¹,这一事件是伊斯兰历史知识研究界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清真寺在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²,清真寺被认为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在清真寺举办学生圈,教授《古兰经》、圣训叙述和对宗教的理解。知识的研究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清真寺,那里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学习和奉献的一切手段。他们得到了食物,为他们建造了房屋,并为他们提供花销。这些清真寺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认为是国际大学,其中包括:

(1) 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由瓦利德·本·阿卜杜勒·马利克³建造的,里面的学习课程是不同的;马立克学派和沙斐仪学派两派在这座清真寺里都有一个学生圈求学。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哈提卜·巴格达迪⁴也有一个学生圈,人们聚集在一

1 伊本·凯西尔《伊斯兰教历史——自始至终》:出版社:贝鲁特的知识图书馆 1991年,第三册,第328页。

2 清真寺遵循的教育系统是教育圈或知识圈系统。长老坐在清真寺的墙壁或柱子附近,他的学生围坐在他周围,记下他告诉他们的内容。在这些学生圈里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之间进行讨论。

3 瓦利德·本·阿卜杜勒·马利克:他是阿布·阿巴斯·瓦利德·阿瓦尔·本·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本·哈卡姆·本·阿比·阿拉斯·倭马亚德·库拉希(伊历50-96年/公元668-715年),倭马亚王朝第六任哈里发。他出生于麦地那,并在其父亲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伊历86年去世后继承了哈里发王位。他的哈里发统治持续了十年,直到伊历96年去世。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1990年,第4册,第348页。

4 哈提卜·巴格达迪:他是阿布·伯克尔·艾哈迈德·本·阿里·本·塔比特·本·艾哈迈德·本·马赫迪·巴格达迪(伊历392年=公元1002年-伊历

起向他接受圣训课程。¹课程不仅限于宗教学，还包括语言学、文学、算术和天文学。²

(2) 埃及福斯塔特的阿穆尔·本·阿斯清真寺，举办了四十多个学生圈，其中包括伊玛目沙斐仪圈。公元四世纪中叶，其学生圈数量达到一百一十圈，其中一些还是为女性提供的。随后出现了高级学位制度；获得毕业证书后，学生可以使用他们的老师的书籍并可以传授他的老师的知识。³

(3) 突尼斯的扎图纳清真寺，建于倭马亚哈里发时期。该座清真寺的创始人是倭马亚哈里发希沙姆·本·阿卜杜勒·马利克统治时期的非洲总督乌拜德·阿拉·本·哈卜哈卜王子。随后这一年（伊历 250 年/公元 864 年）清真寺又进行了多次扩建。这座清真寺在教授各种学科方面具有很高的地位，学生会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清真寺求学，学习《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法学和语言学。⁴

(4) 卡拉维因清真寺，它位于摩洛哥王国的历史名城菲斯，始建于（伊历 245 年/公元 859 年）。伊斯兰教历六世纪初，清真寺得到扩建，面积不断扩大，直至名声大振。该座清

463 = 公元 1071 年），《巴格达历史》一书的作者。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 18 册，第 270 页。

1 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 18 册，第 270 页。

2 拉希姆·卡泽姆·穆罕默德·哈希米和阿瓦蒂夫·穆罕默德·阿拉比：《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出版社：埃及黎巴嫩之图书馆，第 150-151 页。

3 拉希姆·卡泽姆·穆罕默德·哈希米和阿瓦蒂夫·穆罕默德·阿拉比：《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出版社：埃及黎巴嫩之图书馆，第 150-151 页。

4 参见阿卜杜拉·马舒赫：《伊斯兰教和教堂对科学的立场》，出版社：马纳尔图书馆，第一版 1982 年，第 55 页。

真寺以其卓越的学术地位而闻名，求知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除了王子和其他人捐赠的资金外，该座清真寺还有捐赠基金的特别预算。由于该座清真寺的名气很大，曾经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求学者来到这里，甚至欧洲的学生也开始涌向这座科研机构。¹

(5) 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于伊历 361 年竣工，成为科学的灯塔，哈里发向爱资哈尔清真寺提供捐赠，并任命了各种科学领域的教师。由于爱资哈尔清真寺享有盛誉，并且为学生提供一流的设施，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清真寺，直到当年（伊历 818 年/公元 1415 年）参观该清真寺的人数，正如著名学者马格里齐²提到的达到了 750 人，其中包括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这座清真寺一直是一个科学中心，在历史上履行着它的使命和作用。³

在课程的设置中当然也有着明显的伊斯兰宗教特色，《古兰经》及其他一些宗教课程在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古兰经》是小学生学习的第一本入门书，学会《古兰经》后，再继续学习其他学科。进入高等学校后，学习的课程包括

1 参见阿卜杜拉·马舒赫：《伊斯兰教和教堂对科学的立场》，出版社：马纳尔图书馆，第一版 1982 年，第 56 页。

2 马格里齐：他是阿布·阿巴斯·塔基·丁·艾哈迈德·本·阿里·本·阿卜杜勒·卡迪尔·本·穆罕默德·乌拜迪·马格里齐（伊历 392 年 - 伊历 463 年），他是埃及历史学家的酋长，生活在埃及马穆鲁克时代。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 18 册，第 270 页。

3 拉希姆·卡泽姆·穆罕默德·哈希米和阿瓦蒂夫·穆罕默德·阿拉比：《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出版社：埃及黎巴嫩之图书馆，第 151 页；又参见阿卜杜拉·马舒赫：《伊斯兰教和教堂对科学的立场》，出版社：马纳尔图书馆，第一版 1982 年，第 57 页。

传统的学科如《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法律学和理性的学科，如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等，宗教课程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宗教教育的特征也体现在中国经堂教育的内容和课程体系中，尽管西北、山东、云南等地区的经堂教育中学习的经典课程和其他各地略有不同，但学生在学习期间学习的阿拉伯经典和波斯经典基本上相同，他们必须具备阿拉伯语语言知识和伊斯兰宗教知识，语言课程包括阿拉伯语形态学、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专业课程包括教学法、理学和认主学。中国经堂教育也为西北回族乃至整个回族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宗教职业者，由于经堂教育与清真寺相连，而清真寺遍布全国各地，回族聚居的地方几乎都建有清真寺。这样一来，经堂教育机构就数不胜数。

古代阿拉伯伊斯兰教育与中国经堂教育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两者在国家教育系统中有不同的地位。古代阿拉伯实行的是正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政权与教权是合二为一的，这使得古代阿拉伯的教育具有一种明显的伊斯兰教特色。而中国实行的并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政权始终大于教权，各种宗教都在政府的管辖之下。即使在中国的诸多宗教中，伊斯兰教并不是主流的一种宗教，因此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回族经堂教育只是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宗教教育形式，在国家

的教育中处于一种十分边缘的地位。

2、两者在培养目标上有所不同。伊斯兰文化在自身漫长的历史中，一直表现出中道思想的精神，将信仰与务实高度结合起来。这种特点也在阿拉伯伊斯兰教育的目的中得到了明显地体现，即伊斯兰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信仰真主和精神的满足，还要使求学者能够以自己的学问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由此可知，阿拉伯伊斯兰教育虽以宗教目的为重，但也培养各种为国家服务的人才。而中国经堂教育从一产生起就具有明显的宗教目的，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它除了向穆斯林学生灌输伊斯兰文化与信仰、培养其在宗教生活中必须的各种技能外，主要为中国社会培养具有伊斯兰教知识与信仰，为社会的宗教与社会生活服务的人才。

结语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继承了阿拉伯伊斯兰教育的某些传统，如学校设在清真寺内，由所在清真寺的教长和阿訇担任老师，学习内容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核心等等。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也具有显著的民族特点。经堂教育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传承和教育体系，是中国穆斯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伴随着伊斯兰教的长期存在而存在，也将成为中国构建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力量。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不仅为回族社会文化的传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师和宗教学者，在中国回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回族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现代文化素质，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重要途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和传承的基石，它的出现正值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面临生存危机，穆斯林迫切需要一个有组织和有效的教育体系来吸引他们接受和传承伊斯兰文化并敦促他们保护自己的宗教。经堂教育的出现使得伊斯兰教的发展危机得以解决，并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中国穆斯林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

参考文献

1. 中文文献

- [1]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 [2] 丁士仁主编：《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
- [3]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
- [4] 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麦克图巴特》，译者：马生智，出版社：香港天马2010年。
- [5] 周传斌：《经学大师常志美与回族伊斯兰教的第一次革新运动浅识》，《伊斯兰文化》，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
- [6]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祁学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 [7] 赛义德·苏莱曼·纳达维：《阿拉伯-印度关系》，译者：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出版社：埃及国家翻译中心，第一版，2008年。
- [8] 穆罕默德·塔希尔·本·阿舒尔：《阿拉伯伊斯兰教育——历史研究和改良主义观点》，出版社：达累斯萨拉姆，第一版2006年。
- [9] 马继祖：《马复初遗著选》[M]。香港：国际（香港）华人出版社，2003年。
- [10]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1] 马忠、张广麟：《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概述》，朱崇礼主编：《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2]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

- [13] 冯今源、铁国玺：《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
- [14] 伊本·凯西尔《伊斯兰教历史——自始至终》：出版社：贝鲁特的知识图书馆 1991年。
- [15] 山东省民委编：《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年。
- [16] 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年。
- [17] （清）马注：《清真指南》[M]. 余振贵，标点.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8] （明）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 余振贵，点校.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9] 王静斋：《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20] 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 [21] 阿卜杜拉·马舒赫：《伊斯兰教和教堂对科学的立场》，出版社：马纳尔图书馆，第一版 1982年。
- [22] 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 《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年。
- [23] 冯增烈：《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
- [24] 艾哈迈德·哈密德：《伊斯兰教就是这样进入三十六个国家的》，新月图书馆（贝鲁特 - 黎巴嫩），第一版，1981年。
- [25] 阿拉丁·阿里·本·胡萨姆·阿尔丁：《力行者的言行圣行中的宝藏》，出版商：（贝鲁特：信息基金会），1981年。
- [26]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 [27] 托马斯·阿诺德爵士：《伊斯兰教的传播》，译者：易卜拉欣·哈桑、阿卜杜勒·马吉德·阿布丁博士和伊斯梅尔·布哈里，出版社：（开罗：埃及兴起图书馆），1970年。
- [28] 王岱舆：《希真正答》，北京清真书报社，1925年。

2. 中文论文、报纸

- [1] 穆卫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穆斯林》，2023年第3期。
- [2] 马涛：《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与现实》，阿拉伯研究论丛，2021年，总第11期。
- [3]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门户网站：《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2020年硕士研究生班招生简章》，2020.2.5。
- [4] 米寿江：《金陵学派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及其当代意义》，中国江苏伊斯兰教协会官方网站，2014年。
- [5] 张立敏：《回族经堂教育在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及挑战——以云南巍山县永建镇为例》，《学园》2010年第2期。
- [6] 马和斌：《清真寺文化与穆斯林核心价值观之形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9期。
- [7] 马辉芬：《回族经堂语造词法浅探》，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 [8] 海俊亮：《探寻经堂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之路——兼谈全面提高伊斯兰教界的整体素质问题》[J]，《中国穆斯林》2008年第3期。
- [9] 李晓英：《从经堂教育看回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 [10] 李晓英：《从经堂教育看回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 [11] 杨杯中：《自对王岱舆、刘智学术地位的再认识——致杜维明先生的信》，《回族研究》2007年第1期。

- [12] 余葶：《经堂语与穆斯林的日常生活》[J].中国宗教，2006年第8期。
- [13] 丁士仁：《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回族研究》2006年，第4期。
- [14] 李小卫：《浅析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6年第6期。
- [15] 李兴华：《济宁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 [16] 王建平：《论十八世纪初的云南格兰岱教案》[J]. 耘世界宗教研究粹，1998年。
- [17] 马明亮：《西北伊斯兰教育文化》，载《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 [18] 杨宗山：《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四十年工作回顾》，《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12期。
- [19] 杨为仁：《〈经学系传谱〉对江苏伊斯兰教史的重大贡献》，《中国穆斯林》1991年第4期。
- [20] 广增：《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及其基础课初探》，《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2期。
- [21] 广增：《经堂教育基础课的沿革》，《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3期。
- [22] 白寿彝：《马联元-王宽-马万福》，《中国穆斯林》，1984年第2期。
- [23] 冯增烈：《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中国穆斯林》1981年，第2期。
- [24] 王静斋：《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原载《会教论坛半月刊》第二卷，1939年，第2、3、4、5期。
- [25] 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载《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4期。

